

安倍内阁对华“战略对冲”政策及中国的对策思路*

蔡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及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等因素影响，安倍晋三并未像2006年首次上台那样为改善中日关系刻意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而是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并借该问题制造舆论，渲染“中国威胁”，还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拉拢东盟相关国家，构筑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民主安全菱形”，拉美国入局牵制中国，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逼使中国就范。对此，作为中国的对策思路，亟需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运用“两手对两手”的方式，积极实施对日“反对冲”，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关键词】 安倍新内阁 战略对冲 钓鱼岛问题 中日关系

2006年9月，安倍晋三首次组阁时，中日关系正因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陷入僵局。安倍为突破日本在亚洲陷入孤立的局面，刻意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使中日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达成了一致，安倍本人也顺利实现了对华的“破冰之旅”，并与中方领导人就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然而，在因日本政府非法“购买”钓鱼岛导致两国关系跌入谷底的现阶段，安倍的所作所为却与前次大相径庭，非但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并借该问题加大外交攻势，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对此，本文拟在对安倍新内阁对华实施“战略对冲”政策的背景与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就中国的对策思路提出浅见。

一、安倍新内阁对华“战略对冲”政策的背景

对冲(hedging)一词本意是“树篱”、“障碍物”，后引申出“妨碍”、“包围”的意思。对冲政策指用两面下注的方法，达到制约和阻碍对手的目的。^①如果一国的外交为单方面追求战略博弈的利益最大化，意图在对外交往中好处全拿的话，是极易实施“战略对冲”政策的。

如何与崛起的中国打交道是日本对外战略的最紧要课题之一。安倍本人就将两国关系定位为“21世纪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方面的最大课题”，无论在众议院竞选期间，还是组阁后，他均多次表态重视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2012年12月，他在《文艺春秋》上撰文指出：“我第一次执政时，

*本文系2012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青年课题“日本TPP战略的美国因素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课题批准号:2012EGJ001)的阶段性成果。

为了崭新的日中关系，与中国领导人达成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大力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才是日本对华关系的真正利益所在。”^②2013年1月30日，他在众议院接受民主党代表海江田万里质询时再次强调：“日中关系对我国而言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尽管两国间存在个别问题，但双边关系应回到能有效管控问题，不使之影响两国关系大局的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③

此外，安倍还借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访华之际，请他向习近平总书记转交亲笔信，信中表达了希望双方能够从大局出发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和通过各类对话实现首脑会谈等意愿。2013年1月26日，山口完成使命回国后，安倍对山口此行的成果评价积极。之后，他也在众多场合重申两国应从“战略互惠”的视角出发构建双赢关系，双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

安倍将新内阁定位为危机突破内阁，并提出了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胆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及经济增长战略为支柱的“安倍经济学”，以提振日本长期低迷的经济。但经济增长离不开投资、出口、消费这三驾马车，而这与中国均息息相关。因此，安倍多次强调中国在日本外交的重要地位，要使两国关系重回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这并非只是安倍口头说说而已，而是与日本国家利益相符的客观需求。但现阶段，使两国关系重回战略互惠关系原点的前提是如何及时妥善处理好钓鱼岛这一两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

钓鱼岛问题的根源是日本对中国领土的非法窃取和占据。20世纪70年代，中日在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两国关系大局，就将“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谅解和共识。^④对此，日本外务省的一些亲历者如桥本恕、栗山尚一等人早已有明文佐证。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中方也期许安倍能“正视历史和现实，以实际行动，同中方共同努力，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有效办法。”^⑤但安倍所作所为却与前次大相径庭，首先是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表示“关于尖阁诸岛（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很多人主张通过‘以外交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我认为这个问题

根本没有外交谈判的余地。日本所追求的不是谈判，而是用实力确保对尖阁诸岛的‘实效支配’，一经发现侵入该海域的中国船只，立即将其驱逐。”^⑥进而安倍强调如果航空自卫队战机向“入侵日本领空”的外国飞机通过无线电警告未果，可发射曳光弹（一种尾部装有能发光的化学药剂的炮弹或枪弹，常用于指示弹道和目标）进行“警告射击”。按国际惯例，在他国飞机未经许可进入一国领空时，该国可采取无线电、曳光弹等方式进行警告，但一者钓鱼岛海域属于争议地区，二来中国海监飞机大都只是在钓鱼岛毗连区上空飞行，足见此种言论的挑衅性是不言自明的。

其次，安倍还积极制造舆论，倒因为果，不但将两国关系恶化的肇因归咎中国，更将中国诋毁为区域安全的威胁者。如他为制造舆论同情，不惜歪曲事实地称中国海军舰艇火控雷达瞄准日本舰机，却不详细说明中国海军只是启动了火炮火控雷达系统瞄准日本护卫舰，更绝口不提造成该问题的根源是日方舰机在公海近距离跟踪监视中方船只。此外，安倍又向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呼吁北约应与日本加强彼此合作，共同应对因中国崛起导致东亚安全保障环境更为严峻的变化。^⑦安倍还在内阁官房设立了“领土主权对策企划协调室”，旨在向国内外宣示日本对一系列领土问题主张的正当性，谋求国内外舆论的支持与理解。

同样是安倍内阁，又同样面对中日关系的僵局，但安倍在现阶段的所作所为却与前次大相径庭，其背景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及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等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越发需要日本全面配合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是在亚太地区建立新的规制，以对华形成有效的制度约束：军事上增强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提出“空海一体战”构想，强化与盟友及中国周边相关国家的军事合作；经济上主导建立以全面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目标的综合性高水平自由贸易区——“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以便在投资、贸易、金融及劳动等诸多领域重新建章立制；价值观上强调维护人权、推进

民主,相信具有相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是美国最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和盟友。

随着“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为实现“辐辏格局”(hub-spokesystem)中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增强同盟的力量,正积极推动建立“美日+1”模式。对此,安倍在访美时表示“日本回来了”,高调表达了要全面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意愿。军事上,在美国国防预算大幅削减,更加倚重盟国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日本加快突破军事禁区,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步伐均意味着能更好地“协防美国”,发挥战略支点的作用;TPP问题上,日本的加入与否直接关系到TPP能在多大程度上为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因此,美国迫切希望日本参与TPP谈判。以此为背景,尽管面临国内农业、医疗等部门的反对^⑥,安倍还是在奥巴马保证“不要求单方面预先承诺废除全面关税”^⑦的情况下,表态参与TPP谈判;价值观问题上,安倍重申“价值观外交”是内阁外交的原则之一,日美同盟是推行这一原则的基轴。

其次,随着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相关国家对华政策的对冲因素日趋活跃,为日本实施对华战略对冲提供了重要舞台。

东盟基本上实行“大国平衡”的策略,不希望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大国主导格局,而冀引入大国的彼此竞争,继续扮演“小马拉大车”的角色。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它们不但愿意嵌入美国的制度安排中,并对中国提出了一定程度的制度约束要求。尤其是对南海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的声索国,对华政策中的对冲因素更为活跃,不但紧密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希望成为由“美国+盟国”构成的“辐辏格局”的延伸与补充,还主动嵌入日本意图构筑的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的以日本为轴心、它们为车辐的“次辐辏格局”中。这无疑为日本实施对华战略对冲提供了重要平台。

最后,随着日本国内“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对华政策的一味用强与以弱势危机心理为基础的保守化、内向化倾向一拍即合。

“新国家主义”是相对战前“国家主义”的保守思潮而言的,其政治理念强调国家优于个人,个人利益只有纳入到国家利益体系中才能得到保障。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社会逐渐呈现出以弱

势危机心理为基础的保守化、内向化特征,“新国家主义”遂乘势成为日本社会的主要思潮之一。^⑧在内政方面,它号召建立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基础,并认为唯有如此才是对内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正常运营的有效路径;在外交方面,又以深化日美同盟,实现日本的大国化为首选。

此外,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加之少子·老龄化日趋严重和政局的长期动荡,使得日本民众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和焦灼感;而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国内出现了经济上“中国特需论”与安全上“中国威胁论”并存的扭曲现象。因此,安倍内阁不惜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味用强,在迎合“中国威胁论”的同时,还将之与“中国威胁”相挂钩,借以乘势为突破军事禁区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更以此为口实强化日美同盟。^⑨

二、安倍新内阁对华“战略对冲”政策的特征

安倍新内阁在处理对华关系时,一方面想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却不愿正视问题的存在,反而意图重拾“价值观外交”的旗帜,以美国为“后盾”,积极拉拢东盟相关国家,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姿态,其目的是透过“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构建对华“战略对冲”,加大对华的外交压力,迫使中国就范。

2013年2月22日,安倍与奥巴马会谈时强调,随着日本周边安全环境的日益严峻,增加防卫支出、修改《防卫计划大纲》,研究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措施有利于强化日美同盟,而为了提高日美安保体制的行动力,有必要进一步修改防卫指针。实际上,自1月17日起,日美已开始全面启动强化自卫队与美军合作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并希望与《防卫计划大纲》的修订一起进行,其内容将体现强化应对钓鱼岛问题和朝核问题的对策并制定具体措施,为此日美双方将正式着手建立自卫队与美国的全方位合作机制,包括“防灾和救灾;打击海盗、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保护太空和网络空间;援助中东和北非实现民主化”等四个领域。^⑩

从很大程度上而言,钓鱼岛问题延宕至今的根源是美国在中日之间嵌入的一枚楔子。但现阶段,该问题似乎成了日本“绑架”美国的一张牌。

自2010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爆发以来,日本一直要求美国充当其“后盾”,表态支持对华采取强硬立场。

安倍新内阁成立后,十分重视对中国周边国家推进柔性外交,其范围北起俄罗斯、南到东盟,西南至印度,其中尤为重视东盟在建构对华“战略对冲”政策中的地位。以缅甸为例,在五个月的时间内,安倍本人及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两度访问缅甸,不但免除了缅甸拖欠的2000亿日元债务,并承诺提供1000亿的对缅ODA(政府开发援助),加大对缅投资,还要在缅开设经济特区,以支援缅甸经济改革和民主化进程。凡此种皆为战后日缅关系所仅见。接着是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菲律宾、新加坡、文莱和澳大利亚。尤其是访菲期间,两国一致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日本还计划拨款25亿日元,捐赠给菲律宾每艘造价超过10亿日元的巡逻艇,以加强对中国海事活动的监督。最为重要的是安倍选择越南、泰国及印尼三国为其首访国家,并将之视为安倍内阁战略外交的开端,其把加强与中国周边各国的合作作为外交支柱之一的战略已然清晰可见。

2006年,日本曾提出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构想,主张拥有自由、民主等价值观的国家联手开展合作。新一届安倍内阁可谓延续了这一构想,如他在访问印尼时宣布的“东盟外交五原则”中,即涵盖“与东盟国家一道,致力于普及和扩大自由民主、基本人权等普世价值观”;“用法律而非武力手段确保海洋的自由、开放,全力使之成为公共财富”等内容。此外,安倍又提出囊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在内的“民主安全菱形”构想,以在牵制中国方面强化合作。

需要强调的是,安倍在访问中均转达了强化日美同盟,并以此为基础深化与各国合作的大政方针,以便将日美同盟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双边外交连为一体。对此,安倍于2013年2月28日在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总结指出:“我的外交是有原则的,因此我在访问东盟时提出了对东盟外交五原则。概言之,‘战略性外交’、‘重视普遍性价值的外交’及维护国家利益的‘主张性外交’是内阁外交的基本原则。……而固守这些基本原则的基轴正是日美同盟。”^⑬进一步地,在

2013年度的《外交蓝皮书》中,日本更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中国船只不断进入东海尖阁诸岛周边的日本海域,日本的土地、海洋、领空和人民生命都面临种种威胁。……对此,日本决心巩固同美国的联盟,使之成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基础,而加强威慑则是必不可少的。”^⑭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日本为防止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联手合作,主动在“渔业协议”问题上对台释放“善意”,同意台湾渔民可在北纬27度以南的钓鱼岛海域,以及周边12至24海里范围的毗连区内作业,意图借此离间两岸。综上所述,在积极制造舆论同情的同时,安倍透过“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以美国为“后盾”,拉拢周边尤其是东盟相关国家,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姿态,积极构建对华“战略对冲”。而另一方面,他降低声调转而表示两国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借以博得国际舆论的支持,其做法既是落实“战略对冲”政策的具体体现,更显示了迫使中国就范,使之坐到符合日本战略部署的谈判桌前的意图。

三、中国应对中日关系新阶段的思路

有学者指出,无论是安倍内阁对华奉行“政经分离”方针,还是东盟相关国家对华政策的对冲因素日趋活跃,均使中国维稳外交遭遇了越来越严重的逻辑困境和实践挫折,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尴尬局面。^⑮毋庸讳言,包括中日双边关系在内的周边外交战略和政策确实已发展到了新的拐点,面临一系列新的考验和挑战,迫使中国周边外交的维权因素变得日益迫切。但任何外交战略和政策的目標,不宜只是单纯地为因应某具体问题而调整,而应从制度创新与制度能力建设的高度着眼,用宏观视野将焦点问题置于全局战略中进行综合评估,力求在复杂局面中发现机遇,在形势发展中抢抓机遇,在风险挑战中创造机遇,把握好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维护和用好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从根本上而言是做好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

所谓战略定力,意指认准国家长期的发展目

标,克服短期行为的浮躁与冲动,以超然的心态审视发展过程中的挑战与挫折,将焦点集中在主要目标和首要挑战上。为此,“我们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⑥进一步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即“要拓展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其核心是和平共处、包容互鉴、合作共赢。^⑦

中日比邻而居,又都是拥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两国关系可谓是大国及周边关系的复合体,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双边的范畴,对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影响深远。那么,现阶段中国对日外交究竟追求怎样的战略目标,又用什么方式实现?杨洁篪指出:“我们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基础上,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⑧,即不能让钓鱼岛问题影响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也不能偏离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基础上,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会吞下损害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概言之,现阶段中国对日外交的战略目标是维稳与维权并重,维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积极的维稳。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亟需在增强战略定力的基础上做好政策弹力的筹划,实现灵活性和空间性的有机统一。为此,不但要在双边关系上下足功夫,也不能忽视周边及全球层面的政策筹划。

首先,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基本原则,运用“两手对两手”的策略,切实把握好对中日双边关系中大局问题与焦点问题的平衡应对。安倍曾在“迈向新的国家”一文中曾明言,“日中经贸关系紧密,‘剪不断,理还乱’,双方必须有共识,不使这种关系破裂,并以此为基础,致力于政治问题的解决。所谓战略互惠关系,指的正是这一点。”^⑨显而易见,这是一种对钓鱼岛主权争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而单方面强调仅就如何推进双方经贸往来展开对话的“政经分离”手法。

对此,中方应首先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基本原则,强调全面合作、实现包容互鉴、互利共赢的多维度战略性关系才是双方必须共同推进的战略互惠关系。

所谓中日之间的大局问题,意指对双方而言是有利于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深化与东亚经济一体化构建的各种举措,如经济、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及人文和体育等方面的公共外交。前者既包括中日货币互换,还包括中日韩 FTA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不但涉及中日双边范畴,更与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顺利推进息息相关;后者的主要特征是交往对象多元化、交往成效长期化,强调“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因此尤其在敏感问题已严重干扰双边关系发展的情况下,更要加强大局意识,认清唯有中日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关系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一意义而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李小林访日,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访华等举动都是顺时顺势之举。

现阶段的敏感问题,主要指钓鱼岛问题。对于安倍内阁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中国态度明确、立场坚定,“日方应正视现实,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并用实际行动戳穿了日本的谎言。2013年3月,12届全国人大决定将渔政等海洋管辖职能统一到国家海洋局的决定,对更加合理有效地统筹协调中国对钓鱼岛展开的常态化巡航大有裨益。但中国在进行坚决应对的同时,反应也是适度煌克制的,避免问题扩大化、复杂化,努力推动事态走向缓和。一则主权问题具有长期化倾向,因而重点是不使之影响双边关系和地区稳定,并在此基础上聚焦如何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二来钓鱼岛问题除了主权之争外,还涉及海洋资源保护和开发等非传统安全及经济领域,而这恰恰需要双方通过谈判,以合作的方式实现互利共赢。概言之,中国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同中方共同努力,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防止事态升级失控。而中国一方面对钓鱼岛实现了与日本的“交叉管控”,另一方面仍同日本启动了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并积极推进中日韩 FTA 谈判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恰是“两手对两手”策略的最佳运用。

其次,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基本方针,切实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政策落到实处。安倍内阁将对周边国家外交视为“价值观外交”的重要对象,尤其意图与东盟相关国家形成东南两翼策应共同对华的姿态。而从地缘之便、市场潜力、人口红利等因素来看,周边也是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投资的理想基地和潜在市场,尤其是钓鱼岛问题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安倍也有通过加强经济合作,恢复日本在该地区传统政治影响力的意图。以东盟为例,其加强对日合作,既有加强对华对冲的政治意涵,亦有增进合作的经济实惠,而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基本方针,切实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的政策落到实处,需要中国在政治、经济、公共外交及安全四个领域更加努力。

政治上,加强高层往来,谦逊有礼,尤其是虚心听取各国的意见和建议;经济上,鉴于多数东盟国家与中国产业结构相近,经济同质化的竞争大大削减了中国的市场优势及单方向东盟让利的有效性,中国首先要加快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与时俱进地深化产业合作,开辟新的利益分享空间,其次鼓励更多的“走出去”企业,积极以本土化方式融入当地社会,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最后积极推动 RCEP 框架的早日落实;公共外交上,进一步增加在金融合作、对外援助等领域的区域公共产品提供,切实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安全上,加紧与东盟各国展开打击跨国犯罪、防灾救灾等领域的合作,增强双方的军事互信。

最后,坚持“推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理念,准确把握大国的战略互动,综合评估美国对中日两国的双重遏制作用。关于美国在东亚区域的影响力问题,虽然认为只要搞好中美关系,中日关系自然无虞的逻辑并不成立。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且通过与东亚各国在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合作培育的紧密相互依赖而在东亚拥有广泛的安全利益,是本地区最有影响的域外大国。因此可以说,美国是安倍对华实施“战略对冲”政策

的最大“后盾”,而作为日本对华“战略对冲”的“反对冲”,处理好中美关系无疑是重中之重。这首先要求坚持“推动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理念。目前,两国领导人已就共同探索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6月7-8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访问了美国,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而为将新型大国关系的精神贯彻到中美关系的方方面面,习主席提出了四点建议:一要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把两国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场合会晤的做法机制化,用好现有90多个政府间对话沟通机制。二要开创务实合作新局面,美方应在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等问题上采取积极步骤,推动两国贸易和投资结构朝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三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双方应在朝鲜半岛局势、阿富汗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加强在打击海盗、跨国犯罪、维和、减灾防灾、网络安全、气候变化、太空安全等领域合作。四要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积极构建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相适应的新型军事关系。奥巴马总统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表示美方高度重视美中关系,愿在互利互尊基础上与中方构建国与国之间新的合作模式,并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②可以说,这是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调弦定音,确立新坐标。

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已认识到亚太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交织最密集、互动最频繁的地区,一方面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美国也应尊重中国的利益和关切,中美应共同努力增进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对话与合作,携手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③这即意味着对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应充分认识到其对华“制度约束+相互依存”交织的复杂性,准确把握好中美之间的大国战略互动。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美国对安倍内阁的基本方针是“支持+控制”。一方面美国支持安倍内阁

采取对华强硬立场，并借此发挥“离岸平衡手”的作用；另一方面竭力避免局势失控，以免牵涉其中，损害美国的战略布局。^②因此，当安倍曾挑衅地表示如果航空自卫队战机向“入侵日本领空”的中国飞机通过无线电警告未果，可发射曳光弹进行“警告射击”时，美国立刻派时任助理国务卿的坎贝尔赴日表达美国要求其保持克制的意见。进一步地，美国还在钓鱼岛问题上刻意保持一贯的模糊性，即将行政管辖权与主权分离，承认钓鱼岛适用于安保条约防御范围的同时，对主权问题从不表明立场。一言以蔽之，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对中日实质上存在同时施压，发挥着双重遏制的的作用。基于此，综合评估美国所发挥的作用，软硬结合、张弛有度地制定应对之策不可或缺。

四、结论

安倍新内阁对华实施“战略对冲”政策的目的是透过“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加大对华的外交压力，迫使中国就范，使之坐到符合日本战略部署的谈判桌前，即对钓鱼岛主权争端避而不谈，而只与日方就如何推进双方经贸往来展开对话。作为这种两面手法的中方对策思路，应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一方面认准长期战略目标，克服短期行为的诱惑和冲动，不被动地跟着对方的步子走，而是坚持自己的战略规则，以最终扭转战略局部上的被动，实现战略全局的主动，另一方面应立足于对形势的精确评估，深刻洞察主要力量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积极应对新的挑战。

注释：

① Nick Bisley, *Building Asia's Securit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London, 2009, p. 94.

② 安倍晋三：《迈向新的国家》，《文艺春秋》，2013年新年特别号，第131页。

③ 《第183次众议院会议录第2号（平成25年1月30日）》，http://www.shugiin.go.jp/itdb_kaigiroku.nsf/html/kaigiroku/000118320130130002.htm?OpenDocument。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http://www.scio.gov.cn/zxbd/tt/201209/t1222670.htm>。

⑤ 《习近平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5/c_114501696.htm。

⑥ 安倍晋三：《迈向新的国家》，《文艺春秋》，2013年新年特别号，第131页。

⑦ 《安倍强硬举动挑战亚太和平》，《人民日报》，2013年1月14日。

⑧ 蔡亮：《试析农业利益集团对日本政治的影响——兼论“农协”在反TPP活动中的政治影响力》，《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第81-94页。

⑨ 《日美联合声明》，<http://www.mofa.go.jp/mofaj/kinkyu/20/H302013022318425501A/filLink1.pdf>。

⑩ 孙政：《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⑪ “Shinzo Abe's appointment of a scarily right-wing cabinet bodes ill for the region”, *The Economist*, January 5th 2013.

⑫ 《自卫队与美国扩大合作范围》，《日本经济新闻》，2013年1月4日。

⑬ 《安倍内阁总理大臣在第183次国会中关于施政方针的演讲》，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20130228siseuhousin.html。

⑭ 《2013年版外交蓝皮书》（概要），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page3_000048.html。

⑮ 王生、罗肖：《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周边外交之变：从维稳到维权》，《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期，第9页。

⑯ 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⑰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⑱ 杨洁篪：《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3npc/n/2013/0309/c357320-20732450.html>。

⑲ 安倍晋三：《迈向新的国家》，《文艺春秋》，2013年新年特别号，第131页。

⑳ 《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09/c_116102752_2.htm。

㉑ 杨洁篪：《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http://lianghui.people.com.cn/2013npc/n/2013/0309/c357320-20732450.html>。

㉒ John Pomfret, “The U.S. interest in an Asian island dispute”,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6, 2013.

（责任编辑 吴占军）